

# 我們從未「麻煩」過：《紅衣小女孩》系列(2015-2018)之童年寓言研究

呂俊葳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碩士

## 一、背景

童年成為「麻煩」的經驗：作為「麻煩」，從來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本質。當然，更不會是童年／兒童的。如同文化犯罪學者指出偏差、犯罪是一種社會建構的「問題」，媒體展現（presentation）或再現（representation）的偏差與控制是一場對於邊緣群體的文化戰爭。這暗示了某些「正常者」得以利用權力排除、汙名或標籤化弱勢群體的「不正常」以達成鞏固既存利益、創造優勢地位，甚或純粹的偏見。由是，如果兒童不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那麼「麻煩」（the constructed trouble）被製造的意義和製造麻煩的過程（the process of making trouble）是什麼便成為問題，因為它能夠回應現有的困境或指涉某種集體狀態為何將這些帶有強烈異常或失序（anomie）意味的再現，聯繫上童年，更成為社會之於成人期待的投射。

## 二、理論立場

首先，童年研究作為一個學術研究典範的轉移過程，揭示童年何以能夠成為研究的主體。先行研究始自歷史學家的問題意識，其後逐漸擴展至以文化研究為主的其他學科領域。其次，我們檢視電影研究如何因應新興的童年研究，發展成次領域。從兒童文學→兒童電影→童年電影的互相影響及觀點差異，建構一個童年電影的分析框架。此外，本文藉由梳理類型電影的理論發展與批評來回應童年電影的類型之說，並試建立童年電影作為一類型的理想型架構。最後，藉著類型混雜化的概念，將童年與恐怖電影的理論結合，我們討論「恐怖童年」這一特定次類型的研究及其可能的深層結構與文化意涵，探求突破的切入論點。

## 三、文本分析

### 1. 影像美學：

紅衣小女孩的恐怖性藉由兒童在非常的地點展現，兒童除了以混合泥土、髒污的扭曲形象出現之外，也透過附身於成人之上，使成人展現詭異的樣貌來達成死亡對於人類的恐懼。這些形塑魅異空間的基礎建立在一種與現代性的決裂，也標記了一種兒童與文明相對立的屬性。不僅如此，各種外顯的裝扮道具也以極其風格化的方式暗示其與地方感的連結。

### 2. 文化意義：

#### （一）作為國族、本土共同體的投射物

影像當中的敘事者、敘事功能藉由新科技媒介再述都市傳說、民間故事等民俗意象，達到集體記憶的傳承。進一步考察語言腔調，在不同標誌、功能的人物身上以及不同敘事情境出現，反映電影創作者對於語言所代表的認同有特定的集體想像。分析發現，其形塑的正負面意象和過去研究者提出的有所不同。這也正是我們得以指認紅衣小女孩系列仍然在試著鍛造本土意識的關鍵。

#### （二）家庭關係的瓦解與重構

首先，兒童身分存在恐懼與救贖的雙重矛盾。一方面，成人渴望在兒童身上尋找到足以遁逃於資本世界的烏托邦；另一方面，成人又以各種文化符碼強化兒童身體、意識的馴順性，試圖使他們變成成人理想的樣子。其次，我們發現「非核心家庭」常常是導致電影中的角色被「牽走」或是轉化為鬼怪的背景。亦即，對電影創作者或觀眾而言，這是一種集體性的社會焦慮。

接著，我們觀察影像縫隙裡，因為沒有夠好的母親使其兒童的主體得以認知到好的客體，因此轉變成為壞的主體。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說，兒童形成麻煩的一個原因，往往是其個體化不完全的結果。

最後我們指認保守的敘事裡強化厭女的情結。除了墮胎是一種生命政治的鬥爭之外，母職的召喚與失職也成為造成成人飽受兒童鬼魂威脅的原因。總結來說，不僅是母職恐怖，我們主張兒童的鬼魂對於成人來說亦是一種創傷，這個創傷是透過賤斥兒童的方式，來達到與他者畫界的效果。女性、母親、兒童同樣交織成為在社會位置中的弱勢者，成為男性成人觀眾的凝視對象，並且滿足他們的受虐愉悅快感。

## 四、結論

我們對於兒童的態度是愛恨交織的（ambivalence），因此，兒童是否還是麻煩，可能並不是那麼重要。Furedi（2018）說童年恐懼是「對我們自身恐懼的間接表現」。我們既擔心自己從父母輩所受的創傷未能復原，而延續到我們的下一個世代。另一方面，又害怕自己沒有辦法使自己的孩子在發展上得到最「理想」的那個樣貌。